

“直言”与“理想自我”的建构：存在符号学视域下对福柯晚期主体思想的阐释

颜小芳

摘要：与早期对主体的理性而冷峻的批判相比，福柯临终前的讲课因为笼罩着死亡阴影，反而流露对生命的深情眷念和赞颂。与权力相比，生命与自我才是福柯最关心的问题。福柯回顾一生，想要追根溯源。看看早期欧洲人如何生活，他回到了苏格拉底，打捞出几乎快在欧洲思想史中销声匿迹的犬儒主义，来给自己一生做总结。福柯从“直言”入手，提出了“说真话”的伦理向度，并以此为契机，挖掘欧洲被埋没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生命美学”主张，为“理想自我”建构注入新的生命内涵，给世人留下除思想遗产之外，极其珍贵的生命信仰、生活希望。

关键词：直言，福柯，生命美学，理想自我

Parrês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Self—An Interpretation of Foucault's Late Thoughts on the Subject in the View of Existential Semiotics

Yan Xiaofang

Abstract: In the “shadow of death”, Foucault's final lectures showed a deep affection and admiration for lif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ldly rational critique of the subject that characterised his earlier work. In these lectures, life and the self were the issues of greatest concern to Foucault, rather than power. Looking back upon his whole life, Foucault wanted to find out how early Europeans lived. Returning to Socrates, he recovered Cynicism, which had almost disappeared from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and found that it resonated with his own life. Starting with *Parrêsiazesthai*, he put forward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truth-telling”. From there, Foucault dug into Europe’s buried tradit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claimed that it revealed an aesthetics of life that contributed new mean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deal self” and left the world an extremely precious set of beliefs and hopes for life that go beyond the heritage of thought.

Keywords: *Parrêsiazesthai*, Foucault, aesthetics of life, ideal self

DOI: 10.13760/b.cnki.sam.202001003

1970年4月12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教授哲学思想史课程,直到1984年6月他因艾滋病去世,除去休假的1977年,福柯在13年间,一共讲授了13门新课;其中最后一门课的讲稿《说真话的勇气》法文版于2009年整理出版,2011年英文版出版,2016年中文版由钱翰、陈晓径首次翻译出版。正如格罗所说,“1984年的冬天,福柯的生命似乎都打上了苦行禁欲的烙印,而彼时的他也正在描述犬儒者的苦行生活。”(福柯,2018,p.284)这已非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生命诉求。辞世前三个月,福柯在学院中公开说的最后的话是:“太晚了。那么,谢谢。”(p.280)连同他未完成的研究课题,这句“遗言”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在最后这门课中,福柯依然延续了早期思考与研究问题的方法,但较明显的是,与早期对主体的理性而冷峻的批判相比,福柯临终前的讲课,因为笼罩着死亡阴影,反而流露对生命的深情眷念和赞颂。与权力相比,生命与自我才是福柯最关心的问题。福柯回顾自己的一生,想要追根溯源。看看早期欧洲人如何生活,他回到了苏格拉底,打捞出几乎快在欧洲思想史中销声匿迹的犬儒主义,来给自己一生做总结。福柯从“直言”入手,提出了“说真话”的伦理向度,以此为契机,挖掘欧洲被埋没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生命美学”主张,为“理想自我”的建构注入新的生命内涵。

一、从被动形成到主动建构——主体建构的理论背景

福柯在最后一次课程中探讨的问题,其出发点是“一个位于整个西方哲学中心、古老而传统的问题”,“即主体和真相之间的关系问题”。(p.5)福柯说,在《主体解释学》乃至之前,他就已开始了这样的研究。福柯早年一直

都在批判主体；这个批判使其理论鲜活、锐利，但却无法让人心安、慰藉，福柯老是提到忏悔者与神父，他可能需要一个理论，来安放被批判和解构之后，那个已疲惫不堪、破碎凋零的自我。

福柯早期思想的关键词主要是“主体”与“权力”——“我所研究的，毋宁说是探索我们文化中，有关我们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模式的历史。”（高宣扬，2005，pp. 222—223）他通过知识考古的方式，提出历史上“主体形成的三种方式”（Peters，2004）。第一种主体形成方式可用于考察欧洲特有的理性文明特征，即把疯子排斥、隔离出去，导致疯子主体产生；在此基础上形成正常人的主体。与“疯子”类似的是在《规训与惩罚》里，犯人的主体也是通过隔离而成；正常人、理性社会修建了监狱，将犯人排斥出去，从而建构了犯人主体。符号学的“文化标出性”理论认为，社会总由二元结构形成；所谓主体与非主体，在同一个系统中，通过颀颀、对抗的方式，划分出正项、异项，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身份认同，以维持系统的稳定。因而主体与非主体身份、地位不同，但并无本质区别。身份是能指划分所指的结果，其本质是符号对真实生存的替代。莫伟民说：“人之序与符号之序是不相容的，活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话的人只存在于话语消失的地方。”（2011，p. 8）故而福柯写作《词与物》与《知识考古学》，目的就是要质疑西方的真理意志，恢复语言符号所具有的事件性和实在性，“最终消除能指的统治权”（莫伟民，2011，p. 6），让存在回归人自身。第二种主体形成的方式，福柯认为是人文学科知识区分的结果。这点特别符合符号学对人的定义：人是符号的动物；主体是知识建构的产物。人是话语建构的主体。根据莫伟民的看法，“话语”这个词在福柯的《词与物》与《知识考古学》中含义是有变化的。在《词与物》中，“话语”指的是起表象作用的古典语言，它与人的存在是对立的；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对“话语”的内涵进行了纠正，认为“话语”具有实在性和事件性。莫伟民进一步指出：“人的存在与话语的存在是不相容的”（2011，p. 8），人从不存在到存在再到消失，都是西方认识型知识的基本顺序发生变化的结果。

很显然，福柯对权力和知识话语体系中主体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他热切渴望一个理想自我的存在，但这必须在现代文明之外去寻找，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古希腊。福柯在生命的最后四年转向古代，探讨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的主体模式建构方式。他发现欧洲人在古代没有现代人文学科的知识机构，其建构主体的方式乃通过自身建构，即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意愿、想法把自己变成主体。这就是主体形成的第三种方式。

前面两种方式中,主体都是被建构,即由外力推动而成的;福柯发现,古代欧洲人竟然能够自己建构自己,这种主动的自我建构方式,就是福柯说的“自我技术”(汪民安,2016,p.1),即自己通过特定的技术和手段,来重新塑造自己。那么,主体自我建构的领域在哪里呢?福柯认为,它对应三个领域:性的领域(包括性的实践、行为,如何使用性、对待快感,培养自我,塑造自我)、自我教育(自我关心,希腊人、罗马人通过自我教育,能够让自我变成什么样子;自我培养跟导师的关系尤其重要;如何通过自我学习变成主体)和说话的领域,即通过“讲真话”的方式,关心自己,塑造自我。这三个领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活/生命哲学。

福柯生命的最后时日关注的重点是话语领域与生活实践的结合,即通过“说真话”的方式,重新塑造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它超越了话语符号分析的立场,这种重估主体价值的研究,已经是塔拉斯蒂所说的“存在符号学”(Tarasti,2000)领域,即重拾被结构主义符号学忽略的价值和主体,并进行分析、重估。塔拉斯蒂认为“符号的功能性这些年来几乎变成了一个审美标签”(Tarasti,2015,p.11),随之而来的就是“价值现实逃离了我们的掌控,一切事物成为纯粹技术性的功能性问题”(p.11),这样就会导致“价值仍然完全是外在的、先验的,人们无需相信它们的实存:只有意见、语言、话语,但没有先验范畴”,其结果必然会如格雷马斯所说“没有真理,只有关于真理的陈述”(p.11)。当然福柯早年也是这样看待主体及话语的产生的,但很显然,福柯也看到了主体解构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余碧平说:“当代责任理论的缺点就在于把责任这个伦理概念法律化或科学化了,它成了人逃避成为道德责任人的手段。即使有人为发生的错位或灾难负责,那也只是法律或科学意义上的,而与道德良心无关。”(福柯,2010,p.6)对此,塔拉斯蒂认为,存在符号学正是将主体和价值重新请回符号学领域,“任何情况下,此在的主体完全对其价值选择负责”(Tarasti,2015,p.11),即便“如果他天生缺乏某些价值,例如他缺乏教育,他也应该承担其团体责任;例如,他缺少‘发送者’(学校、父母、老师),用叙述学术语表示;他仍然对其所选择的先验价值、他怎样将其模态化进他的价值行动、价值行动的种类与及其随之而来的模态性负有存在性责任”(p.14)。福柯晚年对主体的思考正好向这一伦理学维度敞开。

二、生活哲学——被遗忘的哲学传统

福柯在疾病和死亡阴影之下,提出要阅读一批重要文本,它们主要包括:

《回忆苏格拉底》《斐多篇》《拉凯斯》《阿尔喀比亚德》等。福柯认为,《拉凯斯》和《阿尔喀比亚德》两篇文章都有“关心”原则,都提到应该关心年轻人的教育。只不过在《阿尔喀比亚德》里,它提到的是要照顾灵魂,而在《拉凯斯》里,它提到的是要照顾生活,而这正好形成西方哲学的两大主题:“一方面是一种置身于认识灵魂氛围中的哲学,把对灵魂的认识转变为关于自身的本体论。另一方面是一种考验生活的哲学,考验作为道德材料和自身艺术的生活(bios)。将《拉凯斯》和《阿尔喀比亚德》对话两相比较时,就能较为轻易地辨认出柏拉图哲学、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这两大主题。”(福柯,2018,p.106)故而,在福柯看来,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命题——“认识自我”,就具有了两个维度,一个走向灵魂,指明一种可能的形而上学话语空间,另一个指向作为生存或生命的生活(bios),要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加以考验和检验,因为“认识自己的话语应当确定人类赋予其自身生命的可见外形”。如此,“说真话”的危险,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危险,而是“这个说真话现在要遭遇的危险是要向人们说,他们需要从勇气获得什么,他们给予生活一个风格要付出什么代价”。因此,“要发现灵魂的时候,就需要说真话的勇气。要给予生活以形式和风格的时候,也需要说真话的勇气”(福柯,2018,p.200)。故而,从“认识自己”这个原则,就延伸出两条路线,一条是“必须找到并说出灵魂的存在”,另一条则是福柯晚期最看重的,“给生活(bios)一种可见的形式,和谐的美的形式”(p.322),这正是“生存美学”的任务。

生命,生活,对应的古希腊文是“bios”。它可以是一个美的作品;主体把生命生活构建为审美形式的对象;其生活、生命在其他人眼中表现出来的外观,以及他死后可能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下的印迹,在古代,无论中西,这都曾经是美学考虑的对象。而生命本身,作为美的对象却较少被人们赋予美的风格,且在欧洲历史上,它遭到了双重压制:形而上学哲学的压制和美学本身的压制。生活的问题及对其的探讨,在西方哲学领域不断被弱化、边缘化、消散,乃至遗忘;正是这个遗忘,才让形而上学哲学(理论哲学)达到顶峰,但即便如此,它还是顽强地体现了出来。这种美学的开端,在福柯看来正是犬儒主义。

犬儒主义的创始人是安提司特涅斯,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由于他经常在雅典郊外一个叫作库诺萨尔革斯的体育场同人交谈,而“库诺萨尔革斯”(拉尔修,2010,p.274)这个词正好由“犬”和“白”两个词构成,因此,该地方的意思,就是“白犬”,由此一些人就认为这是“犬儒”一名的由来。而安提斯特涅斯本人也被起了一个绰号,叫“单纯的狗”。(p.274)犬儒学派

最著名的人物是第欧根尼·拉尔修，他称自己是一只受到人们赞扬的猎犬，但那些赞扬他的人却无一敢同他一起去狩猎。有人曾问他做了什么事被称为狗，他回答说：“因为对那些给我施舍的人，我摇尾；对那些不给我施舍的人，我狂吠；对流氓无赖，我则大加撕咬。”(p. 280) 在克尔希达斯的短长格诗中，他曾这样描写第欧根尼：“他真正是宙斯的儿子，天狗第欧根尼。”(p. 287) 第欧根尼死后，他所生活的城邦的长者们和当权者特意为他立了一根柱子，上面有一尊大理石雕成的狗。他的同胞还立了一个青铜像来纪念他，上面写着：“时间甚至可以使青铜朽去，但第欧根尼，整个世代都无法抹去你的荣耀。因为只有你给予终有一死的人以自足生活的教导，向他们指出最容易的生存之路。”(p. 288) 这墓志铭，算是总结了第欧根尼最伟大的功绩，那就是教导人们“关心自我”，认识自我的灵魂，从而过上独立、自足、有尊严的生活，而真的生活方式远比理论教义重要。

在福柯看来，犬儒者之美，就体现在生活方式与“直言”的一致，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或者问，如何让生命印迹变成美的东西呢？根据福柯的观点，那就是说真话——直言：“犬儒主义的稳定特征就是直言的人，说真话的人”(2018, p. 206)；“直言(parrêsia)在犬儒者和犬儒主义的标志中总是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p. 207)。生命可能具有的最美的形式如何与直言(parrêsia)实践直接联系在一起，这在犬儒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三、“直言”与“理想自我”的建构

“直言”或曰“说真话”，从词源上看，指的是“某种说出一切的活动”，古希腊文是“pan rēma”。“Parrêsiazesthai”意思是“说出一切”，而“parrêsiastês”就是“说出一切的人”。根据钱翰的翻译，这个词的希腊文拉丁拼法是“parrêsia”(福柯，2018, p. 4)。这是福柯晚期著作中最核心的术语，余碧平翻译成“说真话”(福柯，2010, p. 400)，钱翰翻译成“直言”，赵灿翻译成“诚言”(赵灿，2017, p. 32)，各有特色，也都很妥当，但从用语习惯上看，“直言”既简洁，又接近口语，因此也就更容易被接受。

福柯通过对苏格拉底临终时嘱咐其门徒献祭一只大公鸡给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个故事的正面阐释，维护了苏格拉底的尊严，肯定了苏格拉底能够坚持真理、保持独立的品格，认为这正是对“直言”这一哲学实践活动的践行。苏格拉底超越死亡，给人们留下了“关心自己”这条原则。福柯在1982年的讲座第一次课时提到，“关心自己”(古希腊语为“epimeleia heautou”)在古

希腊文化中延续了很长时间，但福柯却大致在1981年才使用。“‘Epimeleia’和‘meletê’的相似性既意味着训练，也同时指沉思。”（福柯，2010，p. 13）因此，这个词实质上就是训练自己将注意力向内转，从专注于外在世界到专注自身。这就是“关心自我”的基本意义。《论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叫作“求诸己”；佛教也有“佛不外求”。实际上，无论东西方文明，“关心自己”都是在“认识自我”基本原则之下自我觉醒和自身成长的必要操作。“就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而言，‘关心自己’是在《阿尔西比亚德》中提出并阐发的。”（福柯，2010，p. 168）当然“关心自己”，不仅是要关心自己的身体，还包括真实看见自己的灵魂，并看到它如何与真理发生关系。故而在福柯的阐释中，直言生效的范围，也就从城邦过渡到个体自我内心。就这样，福柯的“直言”理论从其对政治权力进行批判的先前思路中开辟出提倡个人修身的伦理向度，亦即通过修身来塑造“理想自我”，从而达到重新改变他人和社会的目的。“修身”是中国和西方古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命题。古希腊时的“修身”思想，其完美践行者是苏格拉底，他能够做到行为方式与灵魂保持完全一致，这种不分裂、纯粹的个体生命，正好是“真的生活”的体现。儒家也特别重视修身，但它往往与“外圣”联系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君子的必修课，也是帝王之学。儒家的修身，并不导致对现实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否定，而福柯意义上的直言，具有改变现实，甚至革命的要求。其路线是，通过认识自我、照顾自我，而发现灵魂真正的需求；同时将其他人引向这一对自己的关心，又引向了照顾他人的可能性。照顾他人，本质上也是照顾自我，大家都改变了，就是在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

犬儒主义在直言与其生活模式的一致性方面赢得了福柯的赞扬，犬儒主义由此将生存变成了真正的艺术。“犬儒者，就是拿着棍子、拿着褡裢的人，穿着斗篷、穿着拖鞋或赤脚的人，留着大胡子的人，肮脏的人。他也是到处游荡的人，他不属于任何社会，他们没有房子、家庭、家乡和祖国……他是乞丐。”（福柯，2018，p. 211）这是犬儒主义者基本的生活形式。虽然犬儒主义的情况有些复杂，但总体而言，特别是早期的犬儒主义者，大都是“好的和可以接受的犬儒主义的犬儒者”（p. 209）。生存形式与表达真理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犬儒主义者最根本的特征。如果用符号学的方式，分析犬儒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们在符号的能指、所指、主体间形成了三位一体，符号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或意义建构的方式，更是真理的在场：“生活作为真理发出光芒的和原始野性的东西直接在场，这就是犬儒学派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福柯，2018，p. 216）那么，福柯的主体理论，也就超越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局

限，表达了对主体、真理、价值等本质性事物的期许和回归。

在犬儒者那里，可以找到很多有关行为方式的表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身体特征的描述，那就是裸体。这是真理敞开的方式，即不遮蔽、不隐藏、不撒谎：“生命的选择成为真理的轰动性展示，一无所有的生命成为在肉体上建构真理的展示剧院”（福柯，2018，p. 2），所以裸体是犬儒者直言精神的实践形式，也是其哲学本身。“‘犬儒者’指的是‘真理的看门狗’，而真理则指‘赤裸裸的东西’。”（p. 2）

犬儒者往往通过榜样、叙述、事迹和例子来展示其信仰，而不是用理论的、教条的教学。在犬儒主义这里，生活的目标不是重新激活原始思想的内容，而是重新记忆生活中的要素和情节；它唤起的不是源自理论学说的意义，而是让人们通过真实生活重建道德衰落之后做人的力量。与柏拉图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理论传统的重视相比，犬儒者表现出一定的“反哲学”倾向。犬儒者反对的是书斋里的哲学，根据福柯的说法，当“哲学变成教授的职业的时候，哲学生活、哲学伦理、哲学的英雄主义、哲学传统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福柯，2018，p. 263），这正是19世纪初哲学的境况。当哲学成为教授的职业时，哲学就开始消失了；与此同时，一部分人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哲学生活，这就是福柯说的“离开浮士德，进入革命”的“革命生活”（p. 264）。这种意欲建立实践规范的哲学态度，就是福柯所说的哲学英雄主义，而践行它的人，则被称为“哲学英雄”。哲学英雄的生活，是犬儒传统的一部分，且在后世流传下来。

通过研究犬儒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中的演变历程，福柯找到了被传统理论哲学所湮灭、遗忘的一个主题，那就是：“真的生活的主题”，“在生活的形式中表现真理、实践、生产真理”；而这一“真的生活的主题”，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什么是真爱”和“什么是真的生活”，这是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

福柯围绕这个主题，首先提出了“真”的四种形式：“非隐藏、非混杂、正直、不变和无损耗”（福柯，2018，p. 272）。与之相对应的“真爱”的四个特点，分别如下：第一，真爱是没有隐藏的爱情；第二，真爱是没有混杂的爱情；第三，真爱与正直和公正相符合；第四，真爱绝不变化或生异，真爱永葆青春，天长地久。而真爱的定义又使得对“真的生活”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于是，真的生活也有四个特征。第一，真的生活是一种无所隐藏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赤裸裸地面对一切光亮，面对一切人的注视”，“不隐藏任何动机和目的”，“所说与所想，所说与所欲，所想做的与将做的，这之间没有任

何隐瞒和曲折，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其所想的事实，言必信，行必果”，“没有城府”，“简单和真实”。（福柯，2018，p. 275）第二，真的生活指的是“没有混杂的生活”，“没有善恶的混杂，没有快乐与痛苦的混杂，没有罪恶与美德的混杂”，是“没有分裂的生活”。所有分裂的生活，都是人们通往真理的阻碍，因为分裂的人，是被各种欲望控制的人，这些人没有能力获得真理。总之，真的生活与混杂的生活对立，生命一旦混杂，就不再是真的生活。第三，真的生活是正直的生活，也是符合原则、规范的生活。也就是说，真的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同样也在社会生活、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可见，福柯并不反对规范和秩序，恰恰相反，福柯认为，一定的秩序和规范恰恰是个体能够过上真的生活的前提和保证。第四，真的生活是不变质的，摆脱了动摇、变化、变质和堕落，从而保证自身的自由和独立，不依赖、不屈服任何可能的统治，是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满足的幸福生活。在第四个方面，自我管理最重要。自我管理目的是让自我成为真正的主体，过上自主的生活，它不仅对自我有益，也可以帮助他人，最后可以对全人类有益。在福柯看来，尽管犬儒主义在西方历史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历程，但总体上，犬儒者的生活是真的生活。自我应该通过实践真的生活，建立自由独立的主体，这就是福柯理想中的个体主体。

四、结语

纵观福柯一生的经历及其创作可以发现，福柯的学说与其生存状态紧密相关。生命的本质在于变化和成长，故而福柯的学说也并非一成不变，甚至还充满矛盾。自我不是先天的，它可以通过反思去构建，而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去形成。尤其在《说真话的勇气》中，“福柯通过苏格拉底这样的知行合一的典范，把话语和行为的主体重新汇聚起来，说真话具有了超越语言之外的意义，它不是以符号呈现的逻各斯，而是与具体生活密切相关，是指导寻常日用、生活抉择的逻各斯。这种与生活世界、与个人修身融为一体的逻各斯才是直言”（福柯，2018，p. 9）。

人类永远都需要价值和真理。解构和批判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建立更理想的社会，而这个落脚点就是每一个个体生命。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是永恒的，但自我价值的实现永远都要以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为旨归，故而主体不可能真正消失。

但福柯在表达对主体回归的渴望的同时，仍不忘警惕过分强调真的生活

的一系列危害。福柯很感性，但也时刻清醒。他关心欧洲和美国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的问题，它们是将真的生活推向极致的产物：“为了真理而死（人肉炸弹、自杀式袭击），它转向了戏剧性的和疯狂的极限，这种为了真理的极限勇气……直至为此丧失生命或者杀死他人，在欧洲思想的漫长源流中，可以找到这种东西。”（福柯 2018，p. 230）且对生活风格的过分强调，忽略公共秩序和伦理，势必导向资产阶级的堕落或极左疯狂。所以，福柯也呼吁建立规范而理性的社会秩序。除此之外，在宗教活动和政治实践之外，福柯也看到了犬儒主义正深刻影响当代艺术的发展与走向。艺术上的犬儒行为，最终会导致艺术的生活化，而不是生活的艺术化。前者降低艺术的水准和品位，而后者才是真正的生活美学。这是福柯晚年对主体问题的思考给予我们的启示。

主体问题一直是符号学研究的前沿、疑难问题。一切流动的事物都在寻求表达，而符号的表达之于流动的事物而言，有时无疑抽刀断水。存在符号学即对这一棘手研究对象努力进行符号表达的尝试。谁能画出精神的地图？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此，“存在符号学”本身就如同一个想象中的符号，无论是塔拉斯蒂早期在其师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基础上利用经典存在哲学遗产而“创立”的“主体符号方阵”（塔拉斯蒂，2012，p. 84—85），还是近期转向的“Zemic”（Tarasti，2015，pp. 26—27）模式，都需要接受者/读者发挥各自的理解能力和悟性，去填充这份精神地图中的空白。塔拉斯蒂说，存在符号学的关键概念是“超越”（Tarasti，2015），即存在符号学研究一切超越中的事物。超越的事物是现实中缺乏但却存在于我们心灵或观念中的事物。除了经典符号学分析方法，研究者还必须综合运用直觉、领悟、情感等方式，才能更为完整地把握研究对象。（颜小芳，刘源，2018）在主体与真相的关系中，福柯找到的存在符号是“勇气”。勇气并非主体特属，却是理想主体的品质。因为没有压力和对抗，勇气不可能产生。直言是勇气的结果，也势必要承担勇气所需的代价。勇气的意义早已溢出能指的固定范围，蔓延至人的整个生存。故而福柯的主体研究，是对传统、静态、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超越，并与存在符号学产生了交集。

参考文献：

福柯（2001）. 词与物（莫伟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

福柯（2010）. 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福柯（2018）. 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钱翰，陈晓径，译）.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高宣扬 (2005). 福柯的生存美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拉尔修 (2010). 名哲言行录.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塔拉斯蒂 (2012). 存在符号学 (魏全凤, 颜小芳, 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汪民安 (2015). 自我技术: 福柯文选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颜小芳, 刘源 (2018). 论存在符号学电影批评理论建构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以电影《一个乡村牧师的日记》为例.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33 (6), 39-43

赵灿 (2017). 诚言与关心自己: 福柯对古代哲学的解释.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Peters, M. A. (2004). "Educational research: 'Games of truth' and the ethics of subjectivit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nquiry*, 5(2).

Tarasti, E. (2000). *Existenti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Tarasti, E. (2015). *Sein und Schein: Explorations in existential semiotics*. Berlin, GER: De Gruyter Mouton.

作者简介:

颜小芳, 文学博士,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符号学。

Author:

Yan Xiaofang, Ph. D. of Literature, associated professor i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67514129@qq.com